

什么样的母爱,才能支撑她们一次次奔波在“伸冤”路上?

两位母亲的交集

本报记者 石念军



张焕枝眼中的儿子,永远定格在20岁。



杨惠贤母子合影。

59岁的杨惠贤

两位母亲

永不回家的儿子

如发展中的很多中国城市一样,工程遍地的石家庄,天空灰蒙蒙的。一抹翠绿,点缀在城市的西边,那里是绵延的大山。我们到那里寻访另一位母亲,一位与杨惠贤有着同样心病的母亲。

她叫张焕枝。当汽车拐下平坦的公路,穿过一条藏在玉米地间的小路,张焕枝已经在村中那棵大槐树下等候了。她说,这是一棵300多年的树,“知道很多事”。

满目都是青纱帐,张焕枝想忘却忘不掉,“那时候,玉米就这么高”。

那是1994年9月23日,张焕枝的儿子在下班途中,突然被警察抓走,起因正是发生在附近玉米地的一起强奸杀人案。

从那以后,儿子再也没有回家。这是2011年9月20日,当年五十出头的张焕枝转眼已经67岁,而她的儿子,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20岁。1995年,他被执行枪决。

在这个不足1000人的山村——鹿泉市下聂庄,张焕枝看上去跟同龄的老太太并无任何不同,但她无从贪恋别人颐养天年的时光。

“儿子没了,老头偏瘫,种地家

务都得我来干。”家里两亩田地,夏收小麦,秋收玉米,这是老两口一年的口粮。很多农活,已不适合这个年纪的老人操作。何况,这是一个每月要靠200块钱药物维持健康的老太太。

照片上的儿子,依旧是青涩的少年,穿一件蓝色背心,双腿跨在自行车上,腼腆地笑着。

那是17年前,儿子刚刚在工厂上班。一辆自行车在单位和家之间穿梭,生计的改善就如同下聂庄到石家庄市中心20公里的距离,近在咫尺。

但儿子的突然涉案彻底粉碎了这一梦想。1994年9月23日,他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民警怀疑为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。次年4月25日,河北省高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;以强奸妇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,决定执行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。

尽管母亲一万个不相信那一切是真的,现实的生活中,却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护犊者的话语。他们朴素地相信,法院判的,那能有假吗?

儿子被行刑的1995年冬天,父亲服下了一整瓶的降压药,想“一了百了”。长一双大脚的张焕枝把

老头背到了医院,急救4天。次年,老头脑溢血,再无劳动能力。

张焕枝突然觉得,“怕是要认命”。上过初中的她再也没了读书看报的闲情,一天一天,把苦闷全部种到了地里。

日子一晃就是十年。

2005年4月,该案被曝“一案两凶”,落网逃犯王书金供认,此案系他所为。

张焕枝希望又起,她要为儿子洗脱冤屈。但时至今日,这位母亲奔波于河北省高院、河北省检察院、河北省公安厅之间6年有余,没有任何结果。

1787天噩梦

杨惠贤常常都不敢想,今天是怎么过来的,明天又会怎么样。甚至每天出门锁门时,她都会想,还能回来打开这扇门吗?

她不敢想,更想不出。

马上就要五年了,她不想让自己成为祥林嫂,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向每一个人重复。

经常孤零零地回到家里,59岁的人了,一下坐到冰冷的地板上,靠着床头,发呆。

窗帘紧闭,灯火熄灭,没有人知道她在家还是不在家。

不愿意出门的时候,半个月就这么过来了,从地板上起身,再坐到地板上。除了泪水与哭泣,她时常想不出怀念儿子的另一种方式。

到2011年9月21日,儿子已经整整从她的视野里消失了1787天。

那是2006年10月31日晚的一次意外“消失”,之后整整12天,与儿子相依为命的杨惠贤没有得到关于孩子的任何消息。当她突然得知儿子被抓进了保定市北市区刑警大队,心里竟是抑制不住的喜悦,“儿子还活着”。

11月12日,杨惠贤收到警方送来的拘留证,上面写着儿子“因抢劫罪予以拘留”。这位母亲笑了:这孩子胆小,抢劫是绝对不会干的。何况,他是做工程的,几百万上千万的工程,会去抢劫?她想,肯定是公安部门弄错了,调查清楚了,孩子自然会回来。

持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只有杨惠贤。她的儿子后来告诉媒体记者,在接到检察院起诉书得知自己因入室抢劫获罪时,“我当时就高兴了:我怎么可能入室抢劫呢,一点边都不沾,这下该出去了”。

但他们完全错了,事情和料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尽管在她及律师看来,有足够的证据证明,在这一入室抢劫案的事发时间里,杨惠贤的

儿子正在石家庄处理一起交通事故。该案公诉人亦承认证据中有36处“瑕疵”,但仍请求法院予以重判。

2011年9月9日凌晨,杨惠贤又一次听到了儿子被当庭宣判有罪的消息。参与辩护的女律师,与她一起瘫坐地上相拥而泣。

这一个子夜,经过长达14个小时的审理,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当庭宣判,以入室抢劫罪判处杨惠贤之子有期徒刑十三年,剥夺政治权利三年,并处罚金20000元。这一判决结果和此前二审判决一致。

再往前推到2010年11月22日,河北省高院撤销了原来的三次判决,将案件发回重审。

目前,杨惠贤的儿子又一次提出上诉,上诉状上只有6个字:“我无罪,我上诉。”

杨惠贤不愿意将这些事讲给身边的人,但她必须为儿子伸冤,到保定,到石家庄,到北京,法院、检察院、政法委,只要是说理的地方,她一个一个地去,想方设法地往里混,混进去了,见了领导就扑通跪下,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讲给对方听。

曾在单位担任书记职务的杨惠贤,开始变得像旧时的市井街妇,盼望着哪天可以碰到“青天大老爷”。

张焕枝、杨惠贤,两个女人、两位母亲,一位身在农村,一位身居城市,命运本无交集。但当儿子遇到不测时,她们走上了同一条为儿“伸冤”的路。

案情本身的对与错,归根结底,终须由司法作断,我们无从评判。但两位母亲的抉择,无疑是天下母爱的缩影。她们所遭遇的,或许也正是中国正在经历的阵痛。这就是为什么,她们的痛楚,会让我们痛。

命运交集

“咱们的案子一样”

张焕枝、杨惠贤两位母亲,同在石家庄的两个家庭,相距不到18公里。但两个人,常常只是从前来采访的记者口中,了解到彼此的案子详情。

直到有一天,她们相遇。

杨惠贤清楚地记得那一天,2009年9月21日。

在河北省公安厅,公安部派员在此接待,杨惠贤去递交申诉材料。

这时候,她背后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:“《焦点访谈》等栏目都来过我家了,到现在也没解决。”

“我也想找《焦点访谈》啊。”杨惠贤一听,留了意,等这位妇女递完材料出门,上前和她搭话。

这位妇女就是张焕枝。

两位母亲第一次手拉着手哭泣,像是遇到了相见恨晚的知己。杨惠贤邀请张焕枝住到自己家,好好聊聊。张焕枝摆了摆手,“我的车子(自行车)还在动物园门口放着呢。老头也偏瘫了,得回去照顾”。

张焕枝的身影一点点挪开,站在马路上等公交,然后远去。像是看到了自己,杨惠贤突然想哭。

再去探监时,儿子主动提及张焕枝的儿子,劝慰母亲:“妈妈,

你知道他吗?跟他相比,我是幸运的,我还活着。”杨惠贤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。

两年后,2011年9月21日,杨惠贤第一次来到张焕枝的家,两位母亲又一次手拉着手,泪水涟涟。

长久的哭泣之后,两人才坐下来交谈。两个女人这时才发现,她们其实一直都在一条线上奔波。

过去的时间里,她们曾经先后请过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,案件曾被省高院的同一个法官主管,吃过一模一样的闭门羹,甚至先后跪在某个领导面前。

“那真的是一个‘称职的法官’,不管什么时候,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。”杨惠贤话音未落,张焕枝就接茬,“是啊,天热了让我注意,天冷了让我注意。每次都跟我说,你儿子的案子,我们正在加紧办理,很快就有结果了,你回去等着。”

整整四年,这位法官每次都这么答复张焕枝,但张焕枝什么都没有等到。更多的时候,她连河北省高院的大门也无法进入。杨惠贤也一样。

有一次,河北省高院开门接待,对外说分管刑案的副院长会现场受理。杨惠贤早晨5点就去门口排队,排到了一号。但等她进了门扑通跪在地上,报出那位副院长的名字,“我就找他”。对方回

答她,“他没来”。

随后她听说这位副院长不仅来了,而且答复另一位访民“中午11点过来找我”。杨惠贤便和这位访民一起等,结果等到下午两点也没见到人。再去问信访室的法官,对方说:“10点就走了!”

杨惠贤后来打听到,这位副院长的办公室在908房间,然后她在法院门卫处打了一法官的办公电话。对方听她是要来上交材料,便让门卫放行。“进了大院,我啥也不管,奔着908室就上去了。”

还是跟很多时候一样,杨惠贤进门就跪在地上,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,请领导主持正义。

就这样,她连续闯了三次908室。但事情的结果终与她想象的不一样,她慢慢明白了。

“咱们的案子一样,他们要是给咱洗了冤,他们自己就要受牵连。”张焕枝说。

遇到的都是“软钉子”

“1787天”,杨惠贤清楚记得这期间的某一天,自己见到了儿子。她把日子一一记在本子上,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,便一遍一遍地翻看儿子的案卷。现在,哪一句证言在哪一卷,哪一页,她基本都能记住。

她同样清楚地记得,自己已经

去了92趟保定,8趟北京。至于与自家近在咫尺的河北省高院,早已不计算在内。但回头想一想,什么用也没有,遇到的都是“软钉子”,甚至还有人对她讲,“不要破坏游戏规则”。这让她纳闷,“你告诉我游戏规则是什么啊?”

至于本子上——登记的100多封ESM,虽然寄出了,但至今没有任何回音,尽管从网上查询看到,不少都已被签收。

听着听着,张焕枝也一个劲地抹眼泪,“我也知道,找了也没用,但我不去找不甘心。”她的律师也劝,“你年纪大了,北京就不要来了,来了你一个人也见不到,又有什么用?”在此之前,张焕枝去了一二十次北京,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始终不曾迈进。

杨惠贤的丈夫2003年患病去世,此后不足3年,儿子又遭此变故。虽然父母就在身边,但杨惠贤不愿意让80多岁的父母担心。离休的父母知道杨惠贤每月1400元的退休金不够花,便把两人的工资卡一并给了她。偶尔见面时,80多岁的父母告诉59岁的女儿,“以前我们不怕死,可现在特别怕死,哪天我们死了,你们娘俩怎么过?”说着说着,三个人便哭作一团。

中秋节那天,父母那边一遍一遍催她回去吃饭,她都推托家

里有事,来了人,走不开。

这天真是有事,有一媒体记者恰好前来采访。快5年了,杨惠贤第一次捏了饺子。她说,这5年里,除非律师等来家里,赶上饭点做点饭,她没有炒过一道菜,家里全是方便面。

她对张焕枝说,大姐,我羡慕你还有两亩地,干农活的时候可以暂时忘掉一切。可张焕枝没有告诉她,当自己带着馒头去石家庄反映情况,坐公交车的途中就会望见那一片已被整饬为工程现场的玉米地,“每次路过那里,都要勾起心病”。

眼看中午了,在她们两周年重逢的9月21日,两位母亲决定一起做一顿饭,“三位记者碰巧来了,就跟孩子回来了一样,咱们一块给孩子们做顿饭”。她们说,这些年,天天盼着记者来,也不管他们写不写有用没用,只要来了,就说明还有人惦记着。

杨惠贤又说起了这些“孩子们”和她相约,等到儿子回来,如何如何。张焕枝拿过一沓名片说,“孩子们”也是这么说,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,他们还过来,一块放爆竹。

两位母亲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仿佛这一天就在明天。

这两位母亲,张焕枝、杨惠贤,她们的儿子分别叫聂树斌和王朝。